

Concours d'entrée 2025

Voie Orient

Concours externe

Section : Asie méridionale et Extrême-Orient

Langue : Chinois (mandarin)

5^{ème} épreuve d'admissibilité

Une épreuve consistant en des réponses courtes, dans la langue choisie au moment de l'inscription, à des questions à partir d'un dossier dans cette même langue permettant d'apprécier les connaissanc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thèmes économiques, culturels, sociaux de la section géographique choisie et l'aptitude à formuler des réponses complexes.

L'usage du dictionnaire est autorisé pour cette seule épreuve en arabe littéral, chinois, haoussa, hébreu, hindi, japonais, mandingue, persan, peul, swahili, turc et wolof. Pour ces langues, tous types de dictionnaires (à l'exclusion des dictionnaires électroniques) de la langue de l'épreuve vers le français, vers l'anglais ou vers une langue tierce sont autorisés, et vice versa. Les candidats utilisant un dictionnaire de langue de l'épreuve vers une autre langue que le français et l'anglais peuvent utiliser un dictionnaire de cette langue tierce vers le français et l'anglais. Sont, en outre, autorisés les dictionnaires rédigés exclusivement dans la langue de l'épreuve. Les dictionnaires peuvent faire l'objet de contrôles durant les épreuves. Ils ne peuvent être ni annotés, ni prêtés, ni échangés entre candidats durant l'épreuve.

Toute note inférieure à 10 sur 20 est éliminatoire.

Durée : 3 heures – coefficient 3

Sujet

Question n°1 : 中国“无差别袭击”事件为何频发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对此事应对方法。

Question n°2 : 如何看待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其面临的挑战。

中国“无差别袭击”恶性伤人案频发背后有何原因？

BBC 中文 2024 年 11 月 25 日

11 月 11 日珠海体育中心越野车撞人事件之后，中国在一周内至少发生另外两宗无差别袭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接二连三的伤人事情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及不安。

受访专家认为，今年多宗恶性伤人事件频繁发生，背后跟中国经济低迷的困境有关，行凶者容易因现实生活的压力出现绝望的感觉，从而选择以“报复社会”的方式泄愤。

翻查公开报导，2024 年中国起码有超过 20 宗恶性伤人案件，当中包括多宗无差别袭击事件。

11 月 11 日晚，广东珠海的体育中心发生汽车撞人事件，官方称导致 35 人死亡、43 人受伤，指案件是因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11 月 16 日晚，江苏无锡宜兴市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发生持刀伤人事件，警方称造成 8 人死亡、17 人受伤，初步调查指系本届毕业生未能拿到毕业证、对实习报酬不满而回校发泄行凶；11 月 19 日，湖南常德鼎城区永安小学门前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据报多名学生及家长被撞倒受伤，警方通报指伤者没有生命危险。

后疫情时期经济低迷有无影响

8 日之内，中国发生三宗同类型的无差别袭击，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独立学者邓聿文接受 BBC 中文访问时表示，无差别袭击在今年频繁发生，跟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关联，由于目前中国总体经济仍然处于下行的过程中，经济状况不好亦会引伸出不同的社会问题，而个体或会觉得自己无法为力去解决或应对。“悲观的情绪会像瘟疫一样去感染民众，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会影响民众对未来的情绪，对未来非常悲观。”

邓聿文指，从中国目前的社会舆论看，呈现对经济及未来的情绪都是一片悲观的感觉，“如果本来就有气，社会上又看不到希望，可能就会做出这种所谓疯狂的举动。”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仅 4.8%，受到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投资和消费者信心疲弱等影响。世界银行早前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从 2024 年的 4.8% 下降到 2025 年的 4.3%。

疫情解封之后，外界预期中国会迎来经济复苏，但这两年间房地产暴雷、青年失业率高企、消费降级、股市除了 9 月底昙花一现的反弹之外基本持续低迷。邓聿文认为，这是一个连续积累的过程。“疫情三年的封控把人都迫疯了，虽然解封后行动没有受限制，但是原来期待压抑了的消费会爆发出来，这个也没有看到。”

疫情期间，中国亦有发生过恶性伤人事件，然而在疫情之后，趋势有增无减。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告诉 BBC 中文，民众会把疫情时期当成是特殊事件去看待，“那是会过去的，等到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好”。然而，疫情过后，“看到经济下行，也看到自己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很多人这些年的生计、事业、生意都被摧毁了”。

他认为信心丧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在因经济环境导致的巨大生活压力下，“比较好的年头里，一个地方艰难，那就换一个地方、换个公司，生活依然是有希望的，但现在一切都愈来愈难”，在失业率高企、难找工作等情况在疫情后形成常态之后，“你能看到这种艰难是很难过去，不是说换个地方就能变好”。

今年的伤人案有何不同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 10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非在校生的 16 至 24 岁青年失业率为 17.1%。从 2023 年起，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曾一度升至 21.3%，官方曾经一度暂停发布该项数据。

慕容雪村注意到，近一年来网络上的“呼喊式维权”增加，市民在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之后，无法有效透过司法制度去解决，“只能通过网上呼喊”。

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年轻人结伴自杀的案件增加，“官方也没有通报这些人是因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但大概能够想像这些人是因为绝望、走投无路才会选择轻生。”

他指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绝望与愤怒的情绪，当无法释放的时候。“假如那个人不甘心这样就死，那么他们会做什么？”

研究社会发展以及犯罪学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钟华接受 BBC 中文访问时表示，过去在中国生活感到绝望的人部分会选择自杀。“社会边缘的人其实是会选择自杀，但是大家都不太关注。”

她指往年选择自杀的人群通常都是没有声息，惟当“个人式的恐怖主义”事件开始出现，由于事件有着公共性，导致传播力度广泛，“微信、微博、小红书传播得极快，他得到了这么大的关注，其他人本来想自杀的，就会想反正都要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多拖几个人下水。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平，就做了这种事情。”

她也观察到今年类似的案件发生得更为频密，指往年在社会上处于边缘状况的人可能还存在一些希望，但伴随整体经济情况下行，“今年是格外的绝望，会有一种悲观的气氛，很大程度就是他们没有收入，生活上出现一些问题。”

威胁社会稳定？

珠海惨案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依法严惩凶手，并指示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随后网上流传多个社区被要求排查辖区内的“八失人员”以及“三低三少人员”。

“八失”指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三低三少”则指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和疏导管道少。此外无婚姻、无子女、无工作及无房子的“四无人员”也被中国官方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钟华注意到很多案件的罪犯都是年龄 50 岁左右的男性，不少之前都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她认为这些人士需要多加关注，“之前是把他们漏掉了，他们孤单地生活在一个地方，也不会主动寻求帮助。”目前进行的社区排查，她认为之后需要的是对症下药，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援助及制定相关政策。

慕容雪村认为，事发之后的排查是官方为了摸底、掌握情况，把该类人士视为嫌疑人员，“掌握这些人的动向，是为了控制”。而这种手段“进一步消耗更多政府资源来做与经济无关的事情”。

他也承认，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的环境下，难以有更好的防范方法，而目前弥漫在社会的绝望及愤怒情绪，也需要时间来逐渐减轻。“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中国人可能不得不生活在这种情景之中，随时会发生像这种恐怖袭击（的事情）。”

钟华表示，目前的处境也是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状况，“每个人生活都很 stressful、卷、各方面的，生活愈来愈不易。”她指近 20 年来传统的罪案正逐渐下降，惟在发达国家有三类型的罪案是不断增加，包括由个人发动的反社会恐怖袭击、诈骗、毒品。

女性主义电影《好东西》为何能在中国大获成功

王月眉,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24年12月12日

这部女性题材的喜剧片已成为中国票房最卖座的电影之一。

这部电影批评了对女性性欲的污名化和对单亲妈妈的刻板印象。片中提到女权主义学者的名字, 片中一位女性回想曾经经受的家庭暴力, 并谴责中国的审查制度。

这不是什么需要绕过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到某个平台上偷偷播放的独立电影。这是中国目前最卖座的电影, 甚至赢得了中共媒体的赞扬。

喜剧片《好东西》在过去三周连续占据中国票房榜首。在政府打击女权活动人士、鼓励女性结婚生子、严格限制独立言论的时候, 这部影片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出乎意料。

这部影片受到的欢迎反映了中国审查制度的不可预测, 以及观众对以女性为主的故事越来越感兴趣。政府一般允许讨论女性问题, 只要这些讨论不变成权利诉求。《好东西》用喜剧情节缓和了片中的许多社会批评, 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版的《芭比》(Barbie)。

这部电影的票房最初并不高, 但看过电影的女性成了它最热情的宣传者, 电影很快在全国各地上映。

这部电影也遭遇了批评, 有些人抱怨电影中的男性被描绘成无能的形象, 或者显得像是小丑。但总体而言, 关于这部电影的反响还是积极的——甚至来自一些意想不到的方面。

《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了这部电影对日常生活“幽默与荒诞”的描写。文章没有明确认可电影中提出的具体女性问题, 比如家庭暴力, 但表示导演们应该像邵艺辉一样, 反映观众关心的问题。

抵抗婚育，中国年轻女性对官方政策说不

洪理达, 2023 年 11 月 27 日

结婚的压力是在艾米 20 岁出头的时候开始的。

25 岁时，她的中国父母指责她给他们丢脸，因为她还没有结婚的计划。父亲警告她，女人到了快 30 岁的时候，对男人来说就不那么有价值了——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在这个时候，女人的生育高峰期已经过去。艾米 29 岁时，她的母亲威胁说，如果她找不到丈夫，自己就跳楼。

我从中国各地的单身女性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性别歧视的国家宣传将 27 岁以上的单身职业女性称为“剩女”。2011 年至 2013 年，我在中国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了实地考察，我与许多人交谈过，她们忍受自己不想要的关系，往往在个人、经济和职业上做出巨大的妥协。我想告诉她们，不要理会这一切。

如今，许多年轻的中国女性正是这样做的，她们推迟或回避结婚和生育，这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其他更富裕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经历如出一辙。作为个人，这些中国女性通常不愿挑战官方政策。但通过生育选择，她们共同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个激烈而复杂的问题。

面对人口减少和长期经济放缓，中共希望中国的女性温顺、生儿育女，成为社会、经济和人口稳定的保障者。然而，与共产主义早期相比，许多中国女性现在拥有更大的个人自由和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她们正在默默抵抗。

许多中国年轻男性也在回避婚姻。但是，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巨大变化似乎主要是由于女性越来越不愿意做出事业和生活方式上的必要牺牲，也不愿意承担不断上涨的子女教育费用。最近的调查显示，中国年轻女性对婚姻的负面看法明显多于男性。共青团 2021 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30.5%的 18 至 26 岁的城市青年表示“不相信婚姻”；其中 73.4%是女性。

但随着中国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人们对女权主义问题和维护生育权利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女性继续在网上挑战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交流思想。在中国出版业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等女权主义者的翻译作品在中国成了畅销书。

当女权成为“女拳”：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为何在互联网遭到“反击”

2021年1月11日

去年年末，当以在脱口秀中对男性进行犀利讽刺而著称的喜剧演员杨笠再站上舞台时，并没能让所有人都捧腹大笑。

在七分钟的演说中，身穿宽松白色西装的杨笠面带微笑地与台下观众分享自己对于男性的观点，她用带着几分调侃的语气说：“男人还有底线吗”。这似乎点燃了一个积蓄已久的火药桶。

一些知名人士公开向杨笠的脱口秀开火，感到被冒犯的网友也纷纷发帖批评她“侮辱男性”。一个活跃的反女权账号更发起一场运动，号召网友们给中国媒体监管部门递交投诉信，举报杨笠和节目“宣扬仇恨”、“制造性别对立”。

尽管杨笠并未公开表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在社交媒体上，纷至沓来的批评留言都用“女拳”的字样形容她和她的支持者。

在汉语中，“拳”和“权”同音。过去一段时间里，“女拳”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用来形容他们认为激进的支持女权或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人。

“她们就知道无理取闹，什么事都能上升到男女对立上去，然后开始打拳啊”，23岁的江苏大学生小杨对BBC说，他只愿意透露自己的姓氏。

读大四的小杨常在网上批评女权主义者。他认为“女拳”这个谐音词相当贴切，因为“拳头”正体现了他眼中女权主义者胡搅蛮缠、胡乱出击的样子。“他们不是要平权，而是要特权，”他说道。

在中国，女权运动曾是一种长期存在但小众的呼声。2018年，来自好莱坞的#MeToo运动传入中国，并掀起了一阵女性对性骚扰和性侵者的控诉潮，这让女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但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者在互联网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击”。

“出圈”

2012年6月的一天，当上海繁忙的南京西路地铁站出现了两名头戴黑色头巾的蒙面女子时，不少人感到惊奇。她们手里分别拿着两个平板电脑，一个写着“要清凉，不要色狼”，另一个写着“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语。

她们是两名女权主义者，来到这里是为了抗议上海地铁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则言论。此前，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了一张显示一名女性穿着半透视黑色纱裙的图片，下方的配文称：“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这让一些女权人士认为是在将性骚扰的责任推卸给受害者。

尽管只是简单地驻足展示标语，但对中国这个此前鲜有与性别相关的运动的国家来说已相当罕见，这次事件被很多中国女权活动人士视为首个公开进行的反性骚扰活动。

三年后，一场未遂的活动成为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另一个里程碑。五名女权人士因计划举办一场提高公众对公共交通性骚扰关注度的活动被警方拘留了逾一个月。这一事件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被称为“女权五姐妹案”。

2018 年夏天席卷中国的#MeToo 运动是让女权思潮在中国“出圈”的标志性事件。直到这一年，普通人前所未有地关注到女性所遭到的性骚扰和性别欺压。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8 年 1 月至 9 月，有超过 30 名中国社会名人被控曾进行性侵或性骚扰，被控者涵盖学术界、公益界、宗教界和媒体界等多个行业。

“天然的同盟”

吕频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女权主义者面临的舆论压力与来自政治的压力紧密相关。

“我们的政府的确从来都没说支持男权，但实际上中国本身是一个父权的政治，这些指责女权的人拥有的制度性支持永远比女权主义者要多，”她说道。

她表示，因为女权挑战了现有的文化和秩序，女权主义经常被贴上“影响社会稳定”的标签，在一切以稳定为优先的中国，反女权人士拥有了“天然的制高点”。

2018 年，在#MeToo 运动风起云涌时，拥有近 20 万粉丝的“女权之声”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审查者永久封禁。一些读者和女权人士写信向百余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关注被封号一事，但未收到任何回复。还有人向网信部门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但也杳无音信。

“（政府）不仅是他们拉的一个保护伞，而是他们本身就是天然的同盟，”她补充道。“现在很多人说女权是境外势力。他们的这种话术为什么会有效，因为他们完全复制和延伸了政府的话术。”

改变

尽管中国的女权运动遇到了很多阻力，但熊婧对于女权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她称，并不担心女权被“污名化”。

“批评声大，首先是因为赞同的声音是更大的，”熊婧说道。“在中国，相比于很多其他的权利问题，女权还是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存在空间，来让大家慢慢推动这个议题。”

例如，一项全国性的草根运动正在推动在中国大学和中小学的女厕外设立卫生巾互助盒，以打破月经耻辱。该计划目前已拓展到中国至少 338 所学校。流行歌手谭维维在电视演出中演唱了由真实家暴案件改编的歌曲。

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则在去年 7 月宣布，将向公众开放家暴历史查询系统。婚恋对象只需要提供正式身份证、结婚伴侣的身份证资料，即可查询。

熊婧认为，如今很多人对于女权运动仍缺乏了解，认为这是“没事找事”，但这“并不局限于性别议题本身”，而是处于某一种优势地位的人很难通过同理心了解和与自己处境迥异的人的想法。

“比如你在晚上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有人跟在你后面，一般的男人是不会觉得是一个多么恐惧的事，但这种不安感是女性几乎天天都要忍受的，”熊婧说道。“男性需要跳出自己的视角。”

在杨笠的脱口秀引发争议后，曾在中美两国都小有名气的脱口秀演员黄西公开表示赞扬。“她嘴里的‘男人’并不是指所有的男人，是指一些没底线的男人……她抖的包袱是很多男性的盲点，也许因此不被认可。”

熊婧表示，尽管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或受影响最大的人是女性，但男性也同样是受害者。

“很多男性本身也因这种文化背负了沉重的期待，比如要买车买房、要挣钱，他们当然会有压抑，会有不满，”熊婧补充道。“但他们应该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需要改变的东西。”
